

中
国
新
文
学
中
的
文
化
精
神

张鸿声 著

孤

追寻新文学初期的
知识分子精神，
揭示都市文化与
海派文学的内涵，
探求工业文化与
现代工业文学的主题，
关注20世纪90年代
知识分子精神现象

独
与
融
入

河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旨在从现代文化的广阔视野入手，讨论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中的几种精神现象。简略说来，有如下价值：

■ 以现代文化格局为框架，讨论现代中国文化的脉络与流变，以期廓清现代中国的文化问题，并进入到对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当中。这样，既使文学研究纳入到巨大的文化视野中，又使对文化问题的阐释与文学互相渗透，使两者都落到实处，以构成对现代中国精神现象的总体把握。

■ 本书并不泛论文化，而是将文化分析类型化，分为知识分子文化、都市文化、工业文化，等等。从文化形态入手，因而也构成对文学形态的分析，从而，对文学的分析不再是随意的，而是将其视为独特的形态来完成其形态分析，以见出其主体性。

■ 在论及文化时，运用了一些新的研究概念与方法。比如，将工业文化概念导入，因而对劳工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分析便能道人之未道；再如对海派文学分析时导入大众文化概念，这在过去没有人做过。

另外，各章节中都有新观点提出，如鲁迅小说的死亡主题、郁达夫小说中知识者的世俗理性诉求、海派文学的乡土性，等等。

责任编辑 杨卫民

责任校对 赵红宙

封面设计 李健强

版式设计 胡颖君

ISBN 7-215-05611-2



9 787215 056114 >

ISBN7-215-05611-2

定价：21.00元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新文学中的文化精神

张鸿声 著

孤独与融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与融入:中国新文学中的文化精神/张鸿声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12
ISBN 7-215-05611-2

I. 孤… II. 张… III. 新文学(五四)-研究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00091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黄委会设计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11千字

2004年12月第1版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21.00元



序

吴秀明

现代文学研究似乎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成为显学。先是左翼现代文学阐释的传统,确立了政治上民主主义革命论在文学研究中的至尊地位。尔后是 80 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思想史的阐释标准使启蒙叙述成为惟一合法的现代文学研究原则。至 90 年代,现代文学研究似乎又走向了多元。但与此同时,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也被引进中国,对包括现代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有意思的是进行文化研究的较多的并非科班出身的文化学者,而是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人)。文化学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研究,对于打破和克服此前左翼文学和启蒙文学的话语霸权,扩大和拓宽该学科的研究空间自然功不可没,但它将文学看成是纯然的文化实践,而忽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革命”的政治性、“启蒙”的思想性和“审美”的艺术性的多元属性,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看来,任何一种文学阐释都有接近文学事实的合理因素,而当这种阐释成为或被认为是惟一合法的时候,往往便会出现问题。

鸿声这部书稿虽以“文化”为名,却没有上述这样的流弊。他有自己的定位和切入点,这就是希望通过对现代文学在彼时文化格局和生



存状态的把握,来透视其内在深层的精神现象。因此,在这部新著里,他没有简单排拒对左翼文学与启蒙文学的叙述,而是将它们与其他多种文学整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相当开放开阔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大框架。

从书稿看,鸿声把内容分为四个方面,即“新文学初期的知识分子精神”、“都市文化与海派文学”、“工业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学”、“20世纪90年代文化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现象”。乍看起来,这四部分似乎缺少关联,但细读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彼此之间还是有内在的联系,而且在整体上也颇对应现当代文学的文化格局。知识分子的、都市的、工业的文化,这些都是自新文学诞生之初便出现并延续至今的文化脉流。在现当代文学中,除却民间文化一脉被不无荒诞地或置潮头或沉低谷之外,其他这几支文化都对现当代文学构成了持续深刻的影响,并在文学中催生了各种复杂的精神现象。我想,这大概就是这部书稿各部分内容“貌合神离”的主要原因吧。自然,揭示文学中精神现象与文化格局、文化状况的互动关系,就成了鸿声此书的主要动机和出发点。

书稿的主标题为“孤独与融入”,这其实表明了鸿声对社会文化参与的写作立场,也是他思考和观照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比如在第一章探讨“新文学初期的知识分子精神”时,鸿声首先在“五四”知识分子文学中梳理出“孤独者”与“零余者”两种精神现象。前者为与社会决绝的思想斗士,后者为与社会关系暧昧的新文化俗人;前者决然捍卫孤独的反抗价值,以死亡求得尊严,后者抱怨“零余”,以进入社会世俗为内在渴求,以生为渴望。这样一来,在人们原本看来铁板一块的“五四”知识分子文化精神,也便有了分野。而在此章后面的论述中,鸿声又把知识分子在都市里的精神走向归于切近、参与都市与进入乡野,包括其对知识女性在不同时期的各个角色的认知。事实上,可以认定,不同的文化状态,必然造就知识分子不同的精神状态;即使相同的



文化语境,也会使他们彼此的精神思想大相径庭。这就是文学之所为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抓住了这一点,予以学理的揭示,也就抓住了文学研究的根本,而与一般的文化研究划清了界线。

上述这一思想,同样贯穿在海派文学与工业文学两个章节之中。与五四时期的整体文学形态相比,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对社会参与程度显然是大大加深了,这突出地体现在它与都市文化的关联上。具体表现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都市的工业文化,二是都市的大众文化。对于前者而言,鸿声的这部书稿事实上进行了一项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也即工业经济与中国现代文学。他考察了不断增强的现代中国工业经济因素对文学形态的影响,并将此分为三个时期:五四时期囿于劳工神圣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思想突进,30年代基于工业经济主导下社会结构的文学全面参与,40年代初新的政治秩序下的厂矿题材等。对每一时期,作者都有近乎社会学、历史学的对社会状况的严格考察。比如,五四时期虽已有劳工题材,但由于工业经济的薄弱,这种文学始终停留在理念及思潮的层面,因而,“劳工神圣”口号不过是知识分子人道主义情怀的一个补充,一个附属。当时文学中大量出现的人力车夫形象,大体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对30年代,作者则用了若干数据说明,大都市资本主义工业因素的增长,已经改变着社会结构,劳资关系事实上决定着大都市的社会面貌。如此这般,左翼视域中的工业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便获得了相当充分的历史合理性的解释。我们过去的文学史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往往将左翼文学恒定在“社会革命”的维度上而无视或忽略它对工业文学的贡献,这样,左翼文学虽被提得很高,但在实际上却被简单化甚至平面化了;而在80、90年代的有关文学史叙述中,出于“告别革命”的需要,却又对左翼文学极尽贬斥,几乎将它驱逐出文学史。这同样是一种极端和片面,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非文学的研究。没有左翼文学位置的文学史叙述,无论如何,它应当说都

是不完整甚至不严谨的。但是,我们又从哪里去获得对左翼文学的合理性认知呢?我想,鸿声所取用的这一视角及其研究思路,对我们无疑是有启迪作用的,它至少为我们对左翼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观照和把握的可能性。可见传统的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并非无用,关键在于怎样运用,即是否合情合理合逻辑。

由此,我想到文学史叙述的价值体系和真实性内涵的问题。从“革命说”到“启蒙说”,固然是文学史写作的一大进步,但这并不等于后者臻于理想;相反,当我们用启蒙的价值体系观照传统的左翼或革命文学时,一部现代文学史往往就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启蒙理性弱化的历史,它所带来的新的“偏见”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涉及特雷西在《诠释学、宗教、希望》中所说的解释活动中的历史事实与研究主体的复杂关系问题。毫无疑问,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已过的历史形态文学,它的历史事实和文本事实今天当然是无法改变的。我们建立任何一个价值体系,都是为了更好地整合并解释它的存在,而不是凭借新的话语权人为地将其增损贬抑,作主观倏忽意兴的处理。不管怎么说,现代文学史中的左翼文学毕竟是客观事实,并且它的确具有相对的客观性;我们是不能因为“事实”与“主体”之间在实际研究中的不稳定性将它们彼此的关系推向极端,尤其是不能用遗忘或抹灭的立场去进行所谓的文学史的写作。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和道理,我很赞赏鸿声对左翼文学以及五四时期由人道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潮递进的劳工文学的论述;它也许有些传统,但从作者的论述看,这确是历史中的一种逻辑必然,它反映了上文所说的现代文学与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参与程度不断加深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从深层次上讲,就牵涉到新文学的文化精神问题。

如果说鸿声的左翼工业文学研究是不避旧的话,那么他对海派文学的研究则不因热门而惧新。众所周知,这些年海派文学研究硕果累累,成就颇丰,并且已在现代性的都市文化理念中得到定论。而鸿声自



己也曾出版过都市文学的研究专著，可以称得上是都市文学研究的一位专家吧。但通读这部书稿，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这里仍有不少新的思考、新的探索。其中第二章论海派文学两节文字尤可称道。一节是从大众文化范畴去审视海派。大众文化研究是学界近年来对 20 世纪 80、90 年代文化、文学较常用的研究方法，而鸿声则认为，从大众文化的内涵特质来看，事实上它在 30 年代上海就已出现。对这一时段的大众文化，鸿声注重从市民社会并结合中产阶级文化模式中去确定形态特征。这一看法相当独特，论述也颇为独特。我相当佩服鸿声于社会学理论与历史知识的熟稔，因为从论述看，他与一些“空对空”的理论独白者有很大差异。他总能将新理论的使用与扎实的传统的社会学、历史学的批评方法融为一体，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是可信的，而绝非哗众取宠。这样，他就把对海派文学的一些看法，从感性提升到了理性层面。也许，对海派特征的把握，鸿声与前人及时贤的研究并无多大差别，但他对海派特征所附丽的大众文化形态的认知，却别具慧眼，是一个独到的创见。这一点也许与当下流行的日常现代性的文学史叙述不无关系。文学史叙述并不规避传统的社会学分析甚至阶级分析，这可否也算是一种“推陈出新”的研究方法？

另外，关于海派文学的乡土性的研究，鸿声也颇有独到之处。多数研究者往往只在现代质的层面上认识海派，而鸿声却同时看到了它内涵的乡土性的另一面。通过具体深入的研究，他告诉我们：海派文学其实正是融合了现代质、乡土性、中产阶级传统与江南地域特性才显示出其现代文化特质的。完整的海派文学或上海文学，就是由这样一个多侧面、多样性的文化元素构成的，这也是海派文学所在的上海不同于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的独特之处。如果我们在探讨海派文学时只讲它的现代质而不讲其乡土性及地域性，所得的结论就很难令人信服。



读完全书,我一直在想,鸿声的这部书稿与他过去的著作相比,其写作的原动力是什么呢?也许是与时代对话的诉求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时代的对话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在这部书中作者所梳理出的几种文化精神,已内在隐含着他对当下文化文学格局的一种关切,书中讨论的知识分子、都市大众和工业文化等文化现象,其实都是整个20世纪乃至于迄今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我们在这样的文化格局中走完了文学的“现代”历程,那么当代特别是当下和未来文学呢,我们该怎么走?这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是上述研究的必然的逻辑结果。这也就是鸿声为什么不避薄弱,将90年代文化、文学状况作为书稿最后一章的原因之所在。显然,他是想借助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打通”的绿色通道,将现代文学的历史经验直接传承到当代,以应对各种复杂的困境和严峻的挑战,使新世纪中国文学有一个崭新的跃动和蜕变。由此可见,鸿声所谓的对话是超文本的,他已融涵了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文化忧患意识。这大概是他这部书稿打动并引起我无限联想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鸿声年届四十,已步入学术研究的成熟期。近十年来,也推出了一批颇见功力和才气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去年年初,已晋升为教授的他又屈身南下到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求在学业上有进一步提升和拓展。以他既有的成就和学识积累,相信他今后必将大有作为矣。此次他嘱我为其写序,借这个机会写上以上这些话,算是表达我对他的厚望,也是互勉。

2004年12月5日于浙江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新文学初期的知识分子精神	1
第一节 通向坟的路途	
——鲁迅小说中知识者的死亡	1
第二节 感伤的行旅	
——郁达夫小说中的知识者	10
第三节 孤独者与零余者	22
第四节 知识女性的坎坷之路	32
第五节 都市与知识者的精神轨迹	37
第二章 都市文化与海派文学	49
第一节 都市大众文化与海派文学	49
第二节 现代主义:从接受到实践	
——新感觉派与现代主义	64
第三节 新感觉派小说的乡土文化视野	86
附 录	
旧上海的早期话剧	99
旧上海的早期京戏	105



第三章 工业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学	110
第一节 工业经济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	110
第二节 从人道主义到社会主义 ——论“五四”劳工文学	120
第三节 新文学早期的人力车夫形象.....	131
第四节 20 世纪 30 年代左翼工业文学	143
第五节 现代文学中的民族资本家形象.....	154
第六节 新文学中的工人形象.....	165
第四章 20 世纪 90 年代文化与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精神现象	176
第一节 历史的背影.....	176
第二节 从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	182
第三节 中心的消隐.....	190
第四节 启蒙的变异与坚执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的一个侧面	195
第五节 融入大众.....	205
第六节 坚守与退守.....	215
后记	224



新文学初期的知识分子精神

第一章 新文学初期的知识分子精神

第一节 通向坟的路途

——鲁迅小说中知识者的死亡

—

翻开鲁迅的作品，只需稍稍留意，就会发现每一个故事中有那么多对死亡的恐惧、丧仪、迁墓、坟冢、砍头示众、病死……让人不寒而栗。应当注意的是，作品中的知识者，也大都随着故事的结束而死亡。其中不仅有肉体上的死亡，也有属精神层面的死亡，如夏瑜、魏连殳、子君和涓生爱的离异、青年作家的“幸福”理想。那些尚在幸存之列的战士，如狂人、N先生、疯子等，也不过是过客而已。所有知识者，都走向一个目标——坟。

死亡，亘古以来就是呈现在人类面前的哲学问题。在20世纪对人的思考中，死亡的恐怖与在死亡线上的挣扎成为缠绕在人们身上挥之



不去的幽灵。19世纪的理性精神在社会的异化面前却步不前,乐观精神也急转为忧郁。不独欧美,中国的现实也同样严峻。如果说欧美乐观的理性精神被后来的非理性的悲观取代的话,那么在中国,这两者则同时并存。胡适与鲁迅分别是这两种精神的代表,而他们同时义都是强烈的反封建个性主义者。那么鲁迅是怎样对知识者的死进行透视的呢?这是否意味着鲁迅的虚无与精神衰竭,还是其他?

二

在讨论死亡问题之前,有必要把知识者所处的文化环境与自身文化属性弄清。

前一时期国内外学术界对鲁迅的研究,集中在“中间物”说上,我认为,持“中间物”说法的研究者往往忽视了作为思想者和具体存在的人之区别。思想者可以是中间物,如但丁、鲁迅的思想都具有跨时代的特征,并在思想意识上开创一个时代,成为象征性的过渡人物。因此,中间物只是作为新旧意识并存的象征性空壳,并不能说明实际存在的人与其所处的特定环境。鲁迅之所以成为中间物,也正是这个意义。他虽然毕生为中国的现代化奋斗,但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仍然是传统文化的,他自身的许多行为也为这个环境规定、支配而不得不以传统方式生活着。近代知识者这个中间物,是几代先进知识分子使中国实现由封建到现代化转型的象征性过渡力量。鲁迅笔下的知识者无疑是他们的先驱,但他们不得不生活在那个非常具体的传统文化环境中,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尚处在封建的惯性之中,并且由这种惯性与环境给出他们行为的规定性,他们的行为难以逃出传统的束缚。这是分析知识者行为(包括死)的规定性命题。

总体上讲,《呐喊》、《彷徨》给人们提供了一个20世纪初中国的传



传统文化环境,小说中的“庸众”(包括统治者)与知识者都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由于19世纪欧洲的坚船利炮带进来的西方思想学说被知识者们接受,使这个文化环境具有了两种文化势力。传统文人及其体现是这个环境中的同质因素,而表现出逆传统文化而动的先进的思想文化及体制则作为异质因素存在于其中。无疑,农民、官僚、地主、市民及旧知识分子构成了同质因素,成为传统文化环境中占绝对优势的文化势力。知识者作为同质、异质因素的共同具有者,以极其矛盾痛苦的方式存在于这个环境中,是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传统人。他们人数虽少,但拥有新的政治、民族、道德等意识以及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思想,是传统文化环境强大的否定力量。然而他们割不断与传统社会的联系,深层结构上的文化心理定势,诸如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尚处于封建意识的惯性之中。

与传统文化对立,固然使知识者孤立;自身思想与行为的矛盾,则使他们痛苦。但他们又无法超越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去选择人生,发出行为,即使他们明确意识到自身行动的传统方式,也无法斩断自己屁股后面与传统相连的尾巴。比如:狂人拥有沉重的原罪感,虽不断自责,但始终不能摆脱。为了修长明灯,疯子的“祖宗就捐过钱”,因此人们对他欲毁长明灯的行为迷惑不解,并质问:“你不是这村的人吗?”魏连殳“常说家庭应当破坏,一杯薪水却一定寄给他祖母”。《孤独者》“以送殓始”的象征意义就在于:祖母死后的幽灵仍逼迫着活人(包括魏连殳)按传统方式去行事。最有意思的是吕纬甫,他的一切行为都被“孝道”支配,因此一向怯懦的他只有在执行母亲命令的时候,才能“决然”地发出“一生中最大的命令”,以至连自己都吃惊^①。这无疑是在说明,他

^① 据周作人回忆,吕纬甫做的两件事都与作者自己的经历有关。见周遐寿:《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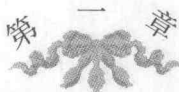
身后“孝”的力量比他反传统的力量大得多,而且更能支撑他的行为。在年青一代知识者中,子君依然摆脱不了对丈夫的依赖,从追求婚恋自由的个性主义者,成为丧失人格主体的主妇;《幸福的家庭》中的作家,尽管标榜如何平等、自由,但在女性面前,依然表现出中国传统的审美趋向……

三

在现代中国,知识者所具有的异质因素与传统文化发生了20世纪最壮观的撞击,而知识者自身的同质、异质因素也同时发生碰撞。对手的强大固然使他们难以战胜,而环境的规定性又迫使他们只能选择传统的生命方式。因此,自身旧我、新我的矛盾也无法超越。既无法逃避理性自我与生命自我的选择,又无法拒绝传统文化给予他们的传统谋生方式甚至复仇方式。种种复杂的原因,使他们被传统文化势力(仍包括他们自我)所吞噬。

鲁迅曾隐指中国人的生命方式是:“人+家禽性=某一种人”,任何的其中成员,若要以新的理性原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都将被旧文化杀害。知识者的先驱狂人发出了使旧文化振聋发聩的“要做真的人”的宣言,这表明知识者已经在争取以新理性为原则的独立人格的价值,显示了与昔日纯粹“活着”的行尸走肉本质的不同。但知识者要实现独立人格的价值,首先必须活着,而且只能按照传统文化所允许的方式。于是知识者们面临着一个悲哀的选择:要么如牛马般活命,要么为了追求人格独立的价值去死,两者必择其一。其实,两个选择对知识者们来说都是死亡,不过前者是精神的,后者是肉体的而已。

统治者与愚昧的群众都以这种方式杀掉知识者。统治者们往往使用暴力与经济压制手段杀掉对他们有直接威胁的先觉者,因此夏瑜的



死比其他知识者都早。但是,最能体现旧文化杀人特点的却在民间。一种民族文化在民间的最深厚体现就是风俗习惯,庸众们便以这把软刀子对先觉者实施最残酷的杀戮。鲁迅也认识到这一点:若不重改风俗,“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压碎”^①。正是这各阶级之间拥有的共同文化,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达成了对付知识者的默契,所用的手段也异曲同工。

一方面,庸众用旧文化杀掉知识者;另一方面,知识者自身的传统性也使自己在两个选择面前败退下来,越来越显示出向传统文化靠拢的可能性。再者,人的求生本能也使他们不得不就范:子君重又投入旧家怀抱,涓生消亡了共同生活的意志,青年作家则茫然无措,N先生愤激之后索性忘却斗争。吕纬甫具体地体现了前一种选择:怯懦的他寻了传统做后盾,使他反而成了那个时代最果决的人。虽然肉体不曾毁坏,但已经丧失了生命价值,成为精神上的颓死者。吕纬甫的倒转表明了一点:知识者们不仅不能战胜敌人,而且有时



鲁迅画像(陶元庆作)

^① 鲁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24页。